

“一带一路”倡议、区域价值链构建与中国产业升级^{*}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将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模式从“汗水经济”转变为“智慧经济”，以摆脱长期以来的“低端锁定”困境。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分析中国依托“一带一路”构建“以我为主”、包容性区域价值链的背景，并重点对区域价值链构建的策略、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联系及产业升级机制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双向嵌套”、开放型价值链体系，区域价值链在加快中国产业高端攀升、带动更大范围协同发展和推动公平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作为多元价值链链接者的中国，应积极培育全球竞争力与资源整合优势，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同时，带动更大范围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有序引导多重市场融合。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区域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20)03-0073-07

DOI:10.13891/j.cnki.mer.2020.03.010

一、引言

全球化进程，也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深化过程。得益于区域合作拓展、现代技术发展及模块化生产等带来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全球产业分工快速从产业间向产品内转变。在此过程中，不同区域以差异化状态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要素高效利用的同时，实现自身经济的增长(张良悦和刘东，2015；秦升，20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产业低端环节、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在逐渐成长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过程中，也推动了产业竞争力提升(刘玉荣，2015；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

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过程中，过去粗放型、低端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无法支撑产业的高端攀升，更难以应对中国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此，迫切需要转变单一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推动创新发展替代廉价要素等，以集约化、高端化支撑中国产业发展(张良悦和刘东，2015；魏龙和王磊，2016；杨静和徐曼，2017)。事实上，伴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国内要素成本提升等，面对高端挤压、低端竞争等双重压力，中国产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Kaplinsky & Farooki, 2011；秦升，2017；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对此，学者提出发挥中国产业优势，在更大范围内构建“以我为主”、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从单一、被动嵌入转向链条合作、主动引领

等(Kaplinsky & Farooki, 2011；张良悦和刘东，2015；黄先海和余骁，2017)。尽管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理解有所差异，但区域价值链主要指以产业升级为目标，联合周边产业互补性强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以实现更高的商品、服务等价值的区域性网络组织；如何抓住全球格局转变契机，建立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广泛利用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等，成为构建区域价值链、加快产业升级的热点话题(刘玉荣，2015；魏龙和王磊，2016；杨静和徐曼，2017)。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携手沿线分享全球发展红利、应对经济发展失衡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也是通过构建全球新型治理平台、加快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张良悦和刘东，2015；杨静和徐曼，2017；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广泛关注、积极响应等背景下，如何构建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成为相关研究热点话题。对相关研究的深化、总结等，对于更好地推动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构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等，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二、“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的背景

1. 全球价值链不平等关系与产业高端攀升需求

全球价值链深化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但作为一个“单极”治理体系，不同国家在增加值获取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伴随着产业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等，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协调发展研究”(编号：16JJD790023)。

这一不平等关系呈现固化态势(秦升,2017;杨静和徐曼,2017)。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价值链中代工、出口的模式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被跨国公司“俘获”于低端环节,不仅带来区域发展差距、产能过剩、产业自主性不足等问题,还增加了贸易利得萎缩风险、抑制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等,“制造大国”与“制造强国”的差距表征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窘况(Brandt & Tun,2011;刘志彪,2017;王炳辉,2017)。

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利用垄断优势、定价权等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技术和规则等制约,通过承接产业转移等嵌入全球价值链,处于市场、技术等多重“低端锁定”的弱势地位(Brandt & Thun,2011;黄先海和余骁,2017;秦升,2017)。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带来低端环节对资源、技术要求的下降,进一步扩大了不同环节地位的不平等;此外,低端嵌入并不能排斥竞争者以类似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的嵌入,加剧了“低端嵌入”被替代、脱离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导致中国产业升级面临高端压制、低端竞争双重压力(黄先海和余骁,2017;杨静和徐曼,2017)。

从国内发展需求看,单一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模式不仅难以为继,也无法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和产业自主可控等战略的提出,表明政策导向下的产业高端攀升迫切需求。未来,应坚持动态竞争优势等理论,构建一条“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实现国内外产业互动、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和利用国外人才、技术等,从劳动密集型环节转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环节,引领更大范围合作网络形成,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刘玉荣,2015;王炳辉,2017;杨静和徐曼,2017)。

2. 世界经济格局转变与“一带一路”发展潜力

全球化推动区域合作冲破民族国家边界,依托更大区域合作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可能。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缓慢复苏、“南—北”贸易增速下降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调整等,给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带来多重压力(张良悦和刘东,2015;黄先海和余骁,2017)。新兴国家旺盛需求和“南—南”合作巨大潜力等,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快速经济增长态势,为中国依托“一带一路”构建包容性、开放式区域价值链,加快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能(Kaplinsky & Farooki,2011;魏龙和王磊,2016;王炳

辉,2017)。

从世界经济格局看,全球市场由“北方”向“南方”转移、加快世界经济“双环流”体系形成等,为避免本国产业“空心化”,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动产业回流,欧美等地区逐渐取代亚洲等代工厂占据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给后者产业升级带来较大冲击(Kaplinsky & Farooki,2011;刘玉荣,2015;黄先海和余骁,2017)。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型多边贸易体系,长期存在的全球价值链形态将发生变化,如“发包—承包”关系改变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资金流动改变产生的投资和产业转移效应、竞争规则改变产生的“脱钩效应”及分工格局改变等,深刻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进程、产业升级过程等^①。

作为全球经济新增长极,“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丰富,人口、GDP和贸易额分别约占世界的63%、30%和40%。据麦肯锡预测,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对全球GDP的贡献将达到80%^②。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资本存在大量需求,为中国利用自身优势等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可能。特别是终端市场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过程中,相对于发达国家较为宽松的产品需求,为中国部分产业通过构建区域价值链,加快向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转型提供了机遇(魏龙和王磊,2016)。

3. “一带一路”合作契机与中国产业竞争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联合沿线国家或地区打造新型化、互利共赢、全面开放的合作平台,不仅契合沿线协同发展需求,也为中国产业升级带来了契机(秦升,2017)。“一带一路”沿线具有贸易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等特点,特别是中国资本、知识密集型等优势产业与沿线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之间的互补性等,为中国主导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可能(魏龙和王磊,2016;张远鹏,2017)。

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倡导的崭新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有效地改善了中国企业在外单打独斗的局面,提高了在东道国的被接纳程度,为中国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深化沿线国家合作等提供了有力支撑(王炳辉,2017)。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力量,区域巨大的市场、标准宽松的产品、运营流程缩短与市场需求反应速度加快等,都为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

^① http://www.sohu.com/a/259511061_701468。

^② http://m.sohu.com/a/225922849_339728。

经过长期技术、资本等积累,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体系,部分制造业已经具备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为主导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基础(Kaplinsky & Farooki, 2011; 魏龙和王磊, 2016)。相关研究发现,尽管“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全球竞争力较弱,但中国部分产业竞争力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如在汽车、机械设备、轨道交通和信息通讯业等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并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中国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必要条件(魏龙和王磊, 2016; 王炳辉, 2017)。

总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显著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较强的产业互补性和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跨区域合作快速推进和良好的一体化氛围等,为中国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提供了良好基础。然而,部分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差、产业配套能力弱,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地缘政治格局不稳定,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耦合不足带来的国内、国际投资双重标准冲突等,都需要中国采取针对性、差异化措施,以公平、开放平台推动区域价值链构建、产业高端攀升(魏龙和王磊, 2016; 张远鹏, 2017)。

三、“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与产业升级机制分析

1. 区域价值链构建的策略

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构建,将单一、低端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转变为“双重嵌入”,即一方面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获取先进技术等促进产业高端攀升。长期以来,多数研究集聚于单一企业嵌入的产业升级研究,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形态。随着政府主导各类园区建设的加快、成熟等,“抱团嵌入”成为中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主要模式(刘志彪和吴福象, 2018)。鉴于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依托“一带一路”的区域价值链构建策略,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1) 单一企业的引领。Lefilleur & Maurel(2010)指出,企业跨国投资有助于地方生产网络的形成、扩展,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企业引领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一方面在沿线布局生产、营销等网络,提升全球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通过在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并购、布局研发网络等,加快形成高端要素“为我所用”格局(刘玉荣, 2015)。具有政策性强、规模大和发展水平高等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理当成为引领区域价值链的主力军,通过在沿线建设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标志性工程,提高企业知名度、竞争力;中小企业通过接受大企业订单、关键产品配套等形式,与大企业

“抱团”参与区域价值链构建(张远鹏, 2017)。

这一策略契合了大企业主导的产业升级需求,如高铁、核电、特高压等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建设具有示范性、带动性的标志性工程,显著提升了产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国际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探索了经验(张远鹏, 2017)。面对差异化发展环境、不同产业价值链治理结构等,单一企业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也应“因地制宜”,如针对发展水平低、内需市场小的资源密集型国家或地区,以资源加工行业为引领,将支撑本地经济的动力转向发达经济体;针对劳动力充裕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依托企业较强的代工技术等,以产品加工、贴牌生产等形式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针对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在东道国共建各类园区等形成优惠政策的“洼地”效应、局部优化的投资环境等,参与东道国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工贸易等活动(刘志彪和吴福象, 2018)。

(2) 产业集群的嵌入。对于部分产业链条长、分工深化和缺乏有竞争力大企业的产业而言,单一企业的引领不仅难以形成完整产业链支撑体系,且面临“走出去”成本高、不确定性较大等难题(刘玉荣, 2015)。对此,在沿线差异化发展状况、良好合作体系等支撑下,以产业集群形式开展区域产能合作、产业嫁接等,建设具有相对完善分工体系、国内外紧密联系的产业集群,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相关产业进入沿线市场,促进中国产业向高端环节攀升(刘玉荣, 2015; 刘志彪和吴福象, 2018)。

产业集群引领区域价值链过程中,一方面促进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网络及分工精细的供应链、生产性服务系统等形成,有根植性地为建设创新、生产系统提供保障,为推动跨区域合作、国内优势产能转移等发挥先行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将总部放在国内,不仅有利于对抗各种不确定性风险,而且有助于借助发达经济体人才、技术优势及新兴经济体资源要素、巨大的市场规模等,实现区域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等之间战略互动(刘志彪和吴福象, 2018)。

不论是单一企业还是产业集群,在构建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应面对不同市场选择差异化方式,如针对国内生产优势明显的产业进行大量出口,与东道国存在较大贸易摩擦的情况下进行海外设厂,存在国家政策限制时推动技术合作或成立合资企业等,避免贸易摩擦,以更大范围支撑中国产业的高端攀升。

2. 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比

未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机制不会消

失,区域价值链构建不是也不可能脱离全球价值链,而应以更加均衡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共享全球化发展红利。二者主要关系如下。

(1) 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差异。作为协调共生的两种开放模式,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表1)。具体而言:在全球价值链单向控制关系中,发展中国家依赖资源禀赋、劳动力等比较优势,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接受技术外溢等,以“世界工厂”“世界车间”的形象满足国际大买家产品需求、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实现有限的升级;“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从沿线国家或地区发展实际、要素禀赋出发,以开放、包容性的协同发展网络,实现对当前全球价值链的补充、制衡,并通过加快全球并购、“逆向外包”等获取全球先进技术,助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实现

表1 不同价值链的产业升级状况对比

| | 全球价值链 | 区域价值链 |
|--------|--|------------------------------------|
| 开放基础 | 低廉的要素成本为主 | 积累的竞争优势、具有竞争力的要素集聚能力和跨国合作等 |
| 开放文化 | 被动接受强势欧美文化的灌输、入侵等 | 主动学习、融入东道国文化,以文化融合推动包容性价值链建立 |
| 开放目的 | 制定优惠政策和吸引发达国家投资等 | 资本、先进经验输出和高效利用更大范围高端要素,寻求内生转型和高端发展 |
| 市场需求来源 | 跨国大买家主导的国际市场为主 | 国内市场、更大范围有议价权的国际市场需求 |
| 市场需求特征 | 稳定,但受跨国大买家价格等控制 | 稳定增长的沿线需求与潜力较大的国内市场 |
| 创新行为特征 | 满足跨国大买家需求的被动创新 | 保持引领力与高端攀升的主动创新 |
| 升级模式 | 被控制在工艺升级、产品升级等有限空间 | 实现较高环节的攀升 |
| 升级动力来源 | FDI与技术溢出等 | 发达国家技术溢出、跨国并购与主动创新等 |
| 开放地位 | 集中在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以“世界工厂”“世界车间”的形象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 | 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研发、“逆向外包”等,成为区域价值链“链主” |

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引领的转变(张良悦和刘东,2015;黄先海和余骁,2017;秦升,2017;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在此过程中,对于以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为终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基于价值链的治理机制差异等,有效构建差异化路径,实现不同价值链之间的对接等,扬长补短加快产业升级。

(2)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区域价值链。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仿、学习和分享技术外溢等,是发展中国家成本低廉的产业升级路径。依托“一带一路”构建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是基于互利共赢等原则,通过强化不同环节的协作、以更长链条为整体,主动参与全球新贸易规则制定、整合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等,实现从被动嵌入、区域主导到全球引领的演变,“迂回”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战略(张远鹏,2017;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特定环节,严重制约了后者的高端攀升。“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通过构建包容性、双向开放平台,打破长期单一、固化的不均衡价值分配体系,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产业升级与协同发展(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在此过程中,中国将发挥“承高起低”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将更多新兴经济体纳入区域价值链,通过产能合作、资本转移和产品贸易等,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另一方面以双向“嵌套型”价值链分工体系、新型区域治理平台等,在与发达经济体互动中进一步吸收、转化先进技术等,为沿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平等对话、经济合作等提供基础,支撑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魏龙和王磊,2016;黄先海和余骁,2017)。

3. 区域价值链构建与产业升级机制研究

依托“一带一路”构建多时空、多领域的开放、合作平台,不仅是中国实现国内经济均衡发展、融入全球创新链和加速产业升级的要求,也是促进更大范围协同发展、纠偏失衡的世界经济结构的重要努力(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总体上,依托“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机制可以归纳如下。

(1)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区域价值链。作为一种更大范围的高水平合作机制,区域价值链通过建立沿线紧密的贸易、投资等联系,推动更多经济体联合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网络、共享全球发展红利(黄先海和余骁,2017)。区域价值链构建过程中,沿线快速发展势头、区域发展差距等带来的转型升级空间、巨大新兴市场 and 新型规则构建机遇等,都为中国经济培育高端环节竞争力提供了基础。

从单一向东开放转向双向开放平台的构建,是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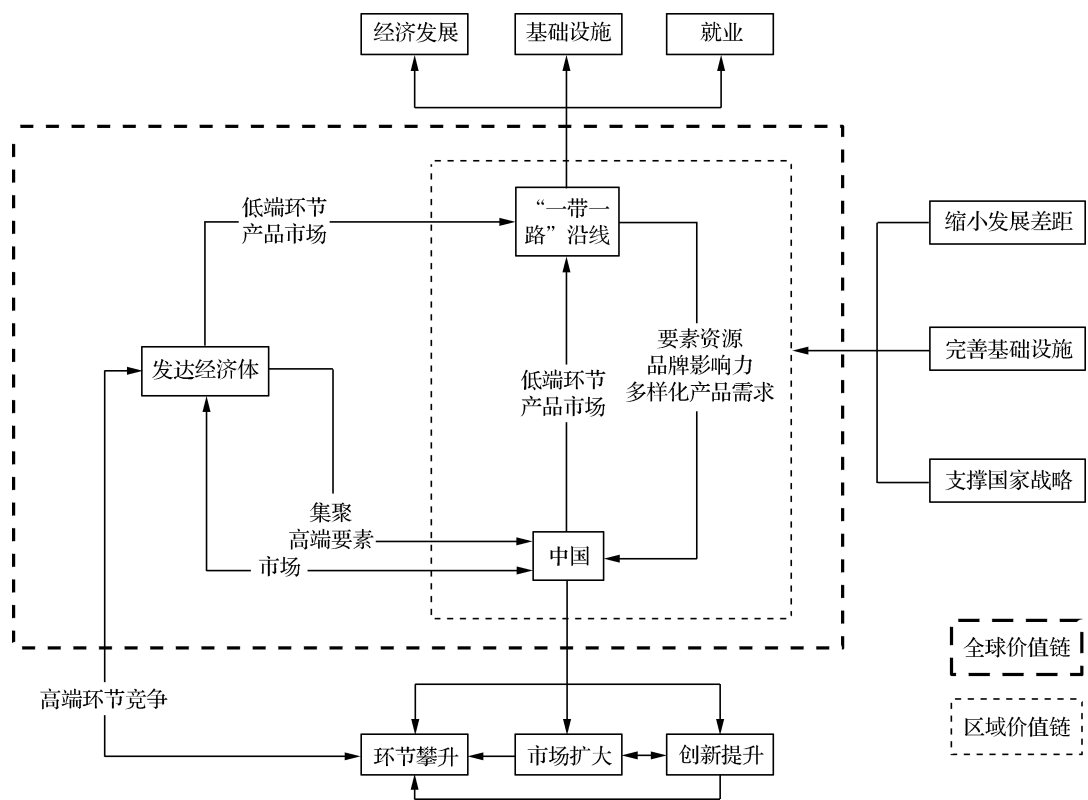


图1 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

“环节对链条”转向“链条对链条”、以更大范围合作支撑中国产业高端攀升的过程。① 通过产业转移实现国内产业“腾笼换鸟”式升级,打破传统生产要素对产业结构的粘性效应、低端锁定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集聚资源从事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逐步将“汗水经济”转化为“智慧经济”。② 通过在沿线兴办园区、出口加工区或实施以“工程”带“产业”等,为产业转型升级、产品提质增效和提升品牌影响力等提供基础;特别是,多样化的产品需求等为中国企业采用自主关键产品替代进口提供了机会,进一步支撑企业创新发展、多元化战略等。基于中高端环节、微观治理机制的掌控,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标准在这一区域先行“走出去”,而且有利于中国适应全球经贸规则、推动更加公平规则的制定等,通过标准促应用培育新兴市场、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推动“以我为主”的全球贸易规则建立(张良悦和刘东,2015;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

(2) 以区域价值链支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是以区域协同发展、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国产业以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高等级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即区域价值链支撑的高端攀升是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互动

的结果。

长期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经验积累等,为中国进一步拓展海外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经营管理和集聚高端要素等奠定了基础;区域价值链支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集聚全球更高端的资源、要素等,为中国产业高端发展提供动力;向世界输出中国丰富的、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和产能的同时,大力引进世界能源、资源和技术等,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集聚效应、市场占有率提高和品牌影响力提升等,支撑产业的高端发展。与技术先进国家开展贸易过程中,通过学习、转化物化的技术、接受溢出等,实现进口替代、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的转变,有效增强产品竞争力、贸易利得获得力。主导区域价值链核心基础的产业竞争力,来源于不断的创新、技术等积累。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依赖巨大内需市场、发达城市群等优势,集聚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能源、技术和人才等;另一方面走出去并购优质资源、技术和企业等,或采用“逆向发包”等方法,实现全球高端知识、技术和人才等“为我所用”,支撑中国产业升级(刘玉荣,2015;张良悦和刘东,2015;黄先海和余骁,2017;刘志彪,2017)。

(3) 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链接。作为新型分工体系的核心枢纽,中国应在主导区域价值链和链

接国内、区域、全球市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同时,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有序引导多重市场融合(黄先海和余骁,2017;秦升,2017)。

多重市场有序对接,关键在于培育中国引领“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能力,充分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维护全球公平市场机制:依托不断壮大的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在国内重要节点城市建立总部基地,推进企业全球范围内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等,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引领包容性价值链的“链主”。构建高效协同的国内价值链体系,在产品出口、协同创新、海外并购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格局,避免国内企业之间恶性竞争导致的资源低效利用。在“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建设价值链的链接节点,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等将其纳入新型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借助紧密合作的价值链通道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向沿线更大区域扩散。即通过沿线比较优势的发挥,强化区域产能合作,发挥中国引领、扩散作用,带动“一带一路”产业整体优化升级(刘玉荣,2015;刘志彪,2017;张远鹏,2017)。

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产业高端攀升需求等,依托“一带一路”构建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成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在大企业或产业集群主导的价值链构建过程中,中国应主动承担引导区域价值链构建的重任,引领沿线错位发展、紧密合作,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反哺、推动沿线的高端攀升。在此过程中,如何有效实现全球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对接,成为构建双向开放平台、带动更大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

四、“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的效应

作为一种更加公平的开放式合作平台,对中国这一价值链主导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而言,都具有积极影响,这也是区域价值链构建的核心基础。

1. 对中国而言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构建,是摆脱“俘获型”发展模式、获取更多全球经济增长红利的有效途径。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构建思路、方法,将参与全球竞争的单一向东开放格局,逐渐拓展到双向开放、全方位开放体系,为产业高端环节的攀升提供机遇(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在扩大产品市场、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延伸产业链和提高对国外生

产要素利用效率基础上,中国将部分非核心环节转移到沿线地区,一方面促使产业从低水平、粗放型向高水平、集约型转变,通过逆向技术溢出等,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新兴产业、优势产业等的发展,为实现国内产业“腾笼换鸟”式再升级、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提供空间(魏龙和王磊,2016;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另一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或地区合作的拓展,显著增加中国 OFDI 及与相关地区贸易往来,有利于中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进而为参与构建全球公平、开放的贸易规则等奠定基础,实现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对接(张良悦和刘东,2015;魏龙和王磊,2016;Du & Zhang,2018)。即中国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过程中,在更大区域合作、多样化市场和重构新型规则等基础上,通过承担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等环节,完善区域价值链,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有效实现产业向更高环节的攀升。

2. 对沿线国家或地区而言

作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平台主导者和“承高起低”中介者的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导区域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输出有竞争力产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带动更大范围的协同发展(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迎合了沿线国家或地区借助外力,实现突破式发展的诉求。从区域发展看,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带来的产业转移、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等效应,在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充足就业岗位的同时,有效推动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成为相关国家或地区达到国际生产标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提高贸易利得等的重要跳板(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看,一方面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沿线基础设施完善、发展多样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等,从而为东道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增加发言权和代表性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将原来发达国家需求驱动转变为发展中国家需求驱动,为沿线企业提供了一个快速反应的需求市场,有利于获得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深度、高度(黄先海和余骁,2017;秦升,2017;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对中国借势“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构建主导的、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推动更加公平的新型价值链体系建立、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和加快中国产业高端攀升等的可行性、模式和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中国产业高端攀升迫切需求、世界经济格局转变和“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深化等背景下,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成为加快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也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区域价值链的构建,是以更长链条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过程。第二,从单一向东开放转向双向开放平台过程中,中国不仅要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差距等带来的转型空间,更要借势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在位优势”等,以并购、布局研发机构、销售网络等加快培育全球价值链高端竞争优势。在此过程中,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是实现多重价值链链接的关键节点。第三,尽管区域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等存在一定差异,但“双向嵌套”的区域价值链构建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业升级等,都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和加快中国产业高端攀升等,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当前,日益壮大的内需市场逐渐替代廉价要素优势等,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新优势。未来,在中国全产业链等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消除行政等壁垒、深化对内开放,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发挥城市群的产业支撑、要素集聚等作用,以城市群为抓手布局产业链、创新链,积极构建、延长国内价值链,加快培育以中国为核心的“多环流”生产网络,实施具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培育计划,特别是培育大型企业成为链接多重价值链的核心。

第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产业转移、资本投资或共建境外园区等多种形式,通过全方位合作减少企业投资风险、阻力,为中国产业走入东道国市场奠定基础;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生产服务网络,建立良好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分工格局,提高服务供给水平;加大对产业走出去的财税等扶持力度,从扶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加强国际海关合作和设立境外投资风险补偿机制等方面,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空间,引导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全球网络。

第三,强化、拓展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投资等联系,完善政府服务管理体系,为企业走向全球“铺路搭桥”;大力培养、引进国际化人才,鼓励企业投资、并购符合企业发展的、全球战略性资产,为企业主导区域价值链提供智力支持;加强对企业的培训,提高对全球规则的认识水平、适应能力;增

强企业海外投资、构建国际生产经营网络的能力,加速形成所有权优势并向“一带一路”集聚,增强区域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 Brandt, L., and E. Thun. Going Mobile in China: Shifting Value Chains and Upgrading in the Mobile Telecom Sec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4(1):148-180.
 2. Du, J. L., and Y. F. Zhang. Does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Promote Chinese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 47:189-205.
 3. Kaplinsky, R., and M. Farooki. *How China Disrupted Global Commodities: The Reshaping of the World's Resource Sector*. London: Routledge, 2011.
 4. Lefilleur, J., and M. Maurel. Inter-and Intra-Industry Linkages as a Determinant of FDI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conomic Systems*, 2010, 34(3):309-330.
 5. 黄先海、余骁:《以“一带一路”建设重塑全球价值链》,《经济学家》2017年第3期。
 6. 刘玉荣:《从被动嵌入到主动构建——GVC视角下产业升级的新路径》,《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10期。
 7. 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8. 刘志彪:《以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9. 秦升:《“一带一路”:重构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方案》,《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9期。
 10. 王炳辉:《“一带一路”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11. 魏龙、王磊:《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可行性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5期。
 12. 杨静、徐曼:《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拓展机理探究——兼论“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构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13. 张良悦、刘东:《“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家》2015年第11期。
 14. 张远鹏:《“一带一路”与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6期。
- 作者简介:闫东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93);马训,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侯祥鹏]